

《红楼梦魇 自序》的非学术隐义*

毛灿月

(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湖南长沙 410208)

[摘要] 张爱玲对《红楼梦》及研究的“疯狂”,是其学术专论《红楼梦魇》的非学术隐义的象征。她与曹雪芹文人品格的共性,源于他们共同的“末世”之感。张爱玲继承了《红楼梦》对悲剧本原的演绎方式,将评点和考据《红楼梦》作为间接诉情文本,消解其对时代与人性的悲剧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给了我们一个解构其人其文的新视角。

[关键词] 红楼梦;红楼梦魇;曹雪芹;张爱玲;隐义

[中图分类号] I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598(2008)02-0110-04

《红楼梦魇》是张爱玲丰厚作品系列中唯一的学术著作,意在评点和考证《红楼梦》。但我认为《红楼梦魇》的价值并不在其学术范畴,解读这部专论的成书过程和文本隐义,尤其是《自序》,对我们审视张爱玲与《红楼梦》及作者的情感渊源,考察她与曹雪芹在精神特质、审美传达等方面的契合,可以为我们更深入研究张爱玲的创作意识和文本意义,提供新的方法和手段。

—

张爱玲移居美国后,沉潜10年于《红楼梦》文本及版本的繁琐考据,1977年由台湾皇冠出版社结集出版专论《红楼梦魇》,算作她经年痴红的自证。张爱玲以“《红楼梦》未完”、“高鹗、袭人与晓君”、“论全抄本”、“甲戌本与庚辰本的年份”、“是创作不是自传”、“改写与遗稿”、“旧时真本”为专题,对《红楼梦》进行了评点和考据;自设疑点,多版本比较,校勘辨伪,大胆假设加小心求证,以“一个字看得有笆斗大”的辞简义丰用字,完成了她的“张看”。2005年,周汝昌曾因此写过《定是红楼梦里人》一书,红学大家亦是性情中人,他在第五部分“人间恨事多”的“字比笆斗大”中,盛赞“只有张爱玲,才堪称雪芹知己”,可见,作家张爱玲确实入了红楼的梦魇。

《自序》是我们解构张爱玲与《红楼梦》的重要视角。300年来,《红楼梦》给不同的研究者提供了不同图式的客体,张爱玲的介入,只是在这

个超文本的多义研究局面里,再描上两笔。但她的学术行动,却为我们对张爱玲的反研究提供了特别的视觉。在这3000字的启篇里,张爱玲很直接表白了对《红楼梦》的“疯狂”。这一显义之外的,是她独特的审美意向和审美定势所生发的种种隐义。正因为这些隐义的存在,张爱玲的《自序》才呈现耐人寻味的张力。她的创作意识与创作心态以“潜文本”的方式存在于文本之中,流露出《红楼梦》之于她的宿命意味。

在任职加州柏克莱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的1969年之前,张爱玲已开始了转入学术研究。曾在哈佛燕京图书馆与柏克莱的加大图书馆借书时,她看到“脂本红楼梦”,对近人的考据,“都是站着看——来不及坐下”。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她考证的着迷入神、紧迫焦渴,二是她能找到的考核和例证资料相当有限。第二个问题事关学术真伪深浅,她解决的办法是“唯一的资格是实在熟读红楼梦”,用这样最单纯的方法直奔第一手材料,反倒使她有“采铜于山”的意外清新收获。张爱玲对《红楼梦》文本的熟悉,达到了“不同的本子不用留神看,稍微眼生点的字自会蹦出来的境界”。

在我看来,《红楼梦魇》的价值并不在学术范畴,而在它的完成过程和文本隐义。在1967年秋天丈夫赖雅去世前,她已经着手于《红楼梦》的考证,1972年,台北幼狮文艺研究社出版的“幼狮月刊学术丛书”《红楼梦研究集》第30卷40期上发

* [收稿日期] 2008-01-12

[作者简介] 毛灿月(1965-),女,湖南湘乡人,副教授,文学学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表了她的最早成果“红楼梦未完”,接下来几年,各专论陆续问世。这些论作均各有所得,各臻其妙,直至结集而成《红楼梦魇》。关于书名,她在《自序》里写道:“我寄了些考据《红楼梦》的大纲给宋淇看,有些内容看上去很奇特。宋淇戏称为 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红楼梦魇),有时候隔些时就在信上问起‘你的红楼梦魇做得怎样了?我觉得这题目非常好,而且也确是这情形——一种疯狂。’《红楼梦》是她凡俗世界之外的别样境界,一个令她“确实什么都不管”的“真喜欢”的境界;“偶遇拂逆,事无大小,只要‘详’一会红楼梦就好了”,“详”《红楼梦》成了她暂时摆脱世俗烦扰,享受精神安宁愉悦的生活内容和方式。她在《自序》里所说“在已经‘去日苦多’的时候,十年的工夫就这样惯了下去,不能不说是豪举”,既有完成某个壮举的富足和自豪,更有了却某桩夙愿的超脱和快慰。“十年一觉迷考据,赢得红楼梦魇名”,她用这两句诗为《自序》作结,再恰当不过了。

张爱玲在 300 年前的《红楼梦》及作者那里,感应到了某种精神契合。他们的文人品格非常接近,他们都有从经验世界里得到的身受感同,当家族大势已去,荣华不再,在“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世态下,用书写的方式为虚幻莫辨的生活、病态的心理、审美观与情爱观等找到宣泄的通道。曹雪芹残缺的《红楼梦》,书写了他“时不我予的世纪末情绪”。^[1]1995 年中秋节前夕,张爱玲悄然离世。在海内外华文缅怀与送行的文字中,1995 年 10 月的《台港文学选刊》上有一个醒目的标题:现代曹雪芹,隐身红楼梦。

在《红楼梦魇》的第一部分“红楼梦未完”开篇,张爱玲写道:“有人说过‘三大恨事’是‘一恨鲋鱼多刺,二恨海棠无香’,第三件不记得了,也许因为我下意识的觉得应当是‘三恨红楼梦未完’。从她“下意识”将《红楼梦》作为生命最强烈情感的归宿,到“有意识”地为之沉潜十年理性考证,可以说,《红楼梦》这部作品里的艺术元素与张爱玲的生命元素融为一体了。爱情婚姻题材选择,饮食男女琐事铺陈和心理描写、形象塑造和语言风格等文本构成因素,可以确证她和它之间的千丝万缕联系。但文本外的潜在隐义,更值得我们探究。

二

曹雪芹对颓败了的贵族世家感情复杂,“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与“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

味”共享《红楼梦》的情感空间,同情、无奈的末世喟叹与悲愤、质疑的否定批判共存于文本中。甚至有学者认为,曹雪芹“对没落贵族的哀叹和惋惜要大于其对没落贵族的批判和讽刺”^[2]。曹雪芹没落贵族的宿命思想和深刻的悲观主义,诉之于这部家族史和情爱史中。

人们习惯把张爱玲的《金锁记》与《红楼梦》放在一起审视,并对前者给予过极高的赞誉:“我们的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3]张爱玲只写人性无涉政治,偏执的创作意识与方式,使她成为现代文学史中的唯一。她在沦陷气氛下横空出世,并依靠表现市民趣味和都市情怀,几近被神话为上海文化精神传统的象征,在某种程度上,源自她的早期的经验和独特的贵族精神气质。

张爱玲的创作意识与风格具有相当的稳定性,根据弗洛伊德还原式的解梦法,追根溯源的童年创伤是梦的隐义,对她产生重要影响的还是早期的经验,即便是 1952 年避居香港后的多种经历,也与她的早期经验构成连带关系,《红楼梦魇》的研究蕴涵了她一生经历所产生的印象。1937 年和 1942 年是张爱玲理想受挫的两个关键年头,分别是她 17 岁和 22 岁。如果说,1937 年那次逃离父亲家,是张爱玲对命运的自主选择 and 安排,其后,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将英格兰之梦改到了香港,是她对命运退而求其次的委曲求全,那么,1942 年从沦陷的香港再退回到出生地,是她人生至此最无奈、最被动的一次选择了。

1940 年《西风》杂志刊出了她的应征作品《天才梦》,其中很出名的一段话是:“……生命只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样的句子,出自一位 19 岁少女的笔下,不能不说她性格里有着与年龄不相称的敏感、忧郁、成熟、世故,过早涉入悲凉的事已给她的心灵铺上了灰暗、苍凉的底色。张爱玲的末世贵族精神气质是有家族渊源的。她有着显赫的家世,祖父张佩伦是清末“清流派”的重要人物,任李鸿章的幕僚,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祖辈的煊赫遮掩不了父辈的衰落。张爱玲并不张扬已没落的家世,她晚年写的《对照记》里共收照片 54 幅,大多是她的个照以及与家人朋友的合照,除此之外,最多的就是她祖父母的照片。张爱玲在书中说:“满目荒凉,只有我祖父母的姻缘色彩鲜明,给了我很大的满足,所以在这里占掉不和比例的篇幅。”

对作家而言,家族的盛衰是养成复杂情愫的重

要源泉。她对自己的贵族渊源是刻骨眷念的,“我没赶上看见他们,所以跟他们的关系仅只是属于彼此,一种沉默的无条件的支持,看似无用,无效,却是最需要的。他们只静静地躺在我的血液里,等我死的时候再死一次。我爱他们。”这是《对照记——看老照相簿》里的一段话,这部书是张爱玲去世前的两年,将自己的很多老照片配以文字,出版的最后一本书。到生命的最后,张爱玲都坚守信念:祖辈的贵族尊贵感与荣耀感,是自己一生最“需要”的精神支柱。可以推想,贵族世家光环照耀陪伴的这位历经沧桑的苍凉女性,她童年母爱缺席、少年父母离异、青年学业中断、中年离乡去国、晚年魂逝异乡,期间还加上发生了一场从惊世骇俗到“萎谢了”的爱情,一段11载的沧桑艰难的婚姻;但这光环能照彻她的一生,所赐予的精神力量和温暖,足以令她从容冷静傲视一切磨难。

贵族气质存在于张爱玲的文化血脉中,不管她的语境发生怎样的变化。上一个时代因权力、财产而高于其他阶层而形成贵族特权意识,其本质意义在于具有裁决命运的掌控力量,但到张爱玲的经验世界里,特权本身已荡然无存,特权意识只剩下了贵族的表面形式的无限遐想。精致的摆设、华丽的服装、讲究的起居、高雅的欣赏,张爱玲在这些生活细节上流连忘返,总把它们与爱情、婚姻、家庭、金钱的叙事扣在起来,其作品的字里行间满是对奢华的叹息。“玫瑰紫绣花椅披桌布,大红平金五凤齐飞的围屏,水红软缎对联,绣着盘花篆字。梳妆台上红绿丝网络着银粉缸,银漱盂,银花瓶,里面满满盛着喜果。帐檐上垂下五彩攒金绕绒花球,花盆,如意,粽子,下面滴溜溜附着指头大的琉璃珠和尺来长的桃红穗子”,《金锁记》里对这些陈设不厌其烦地把玩,背后是她对颠覆了的时代的忧和怨。

和曹雪芹一样,张爱玲终其一生也没有完成对颠覆了的时代的超越,幽怨交织的矛盾心态,使他们都深陷在温暖的泥沼中无法自拔,因此,有学者评价说,“张爱玲是晚清的中国士大夫文化走向式微与没落之后的最后一个传人,……同时又生存于贵族文化的没落时期而携上了浓重的末世情调……”^[4]

三

张爱玲在《存稿》一文,追忆自己14岁那年,写了个纯粹鸳鸯派章回小说《摩登红楼梦》,像模像样地拟订共计五个回目,可见《红楼梦》不仅侵

入到她的精神气质,而且具体指导她的叙事表达。

《红楼梦》持久地震撼历代读者心灵的文本魅力,还是在于它的悲剧意蕴,它是“悲剧中之悲剧”,^[5]其人物无不与痛苦相始相终。曹雪芹将美好被毁灭的过程进行一咏三叹的描述,全然没有给读者任何传统阅读上的情感抚慰和满足;读者在怜惜、诧异、激愤的复杂情感中,完成对这曲悲剧的审美体验,深深体味作家的末世悲哀,同时,“人们对《红楼梦》的兴趣就是对于世界、对于生活、对于人自身的兴趣。”^[6]《红楼梦》里“生于末世”的慨叹,源自曹雪芹对日渐式微的社会的危机感和忧患感。对时代与人性,张爱玲同样充满着危机感。经过“五四”的扫荡,旧生活方式和文化形式已经沉沦,新的生活轨道并未完全形成,这是一个新旧之际的“末世”和“乱世”。加上世界范围内的战争危机,普通人的生存已面临严重威胁。张爱玲曾说:“像‘五四’这样的经验是忘不了的,无论湮没多久也还是在思想背景里。”(《五四遗事》)张爱玲与生俱来的贵族文化,因时代的没落而濡染了末世情调。以上的种种杂糅,使张爱玲忧虑又无奈:“我想到许多人的命运,连我在内的;有一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身世之感’普通总是自伤、自怜的意思罢,但我想是可以有更广大的解释的。”(《我看苏青》)因此,她的末世情怀不止于个人命运,而是“许多人的命运”,是“更广大的”伤世情怀;她创作里的种种病态人性世界,也是时代整体意义上的悲剧世界。所以,有学者评价张爱玲“破坏佳话,所以写得好小说”。^[7]

张爱玲深受《红楼梦》悲剧意蕴的影响。1943年至1945年,她出版的小说集《传奇》和散文集《流言》,最能代表她的创作意识和创作风格,也是她与《红楼梦》之间渊源关系的确证。不可逃离的困境,无可奈何的式微,无能为力的挣扎,是贯穿于张爱玲作品的深沉悲叹。优秀的作家总是和他的人物合二为一,难分彼此,同曹雪芹类似,张爱玲将生命感受键入到了她的人物命运之中,她在《传奇再版序》里表述自己生存受到的严重威胁的体验:“个人即使等得及,时代是仓促的,已经在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有一天我们的文明,不论是升华还是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张爱玲用时代的故事,印证了曹雪芹的“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悲剧归宿的永恒意味。在新旧交替的时代,绝大多数作家以自觉的意识和积极入世精神,呼唤新生活或抨击旧世界,而张爱玲却专注于乱世中俗

人俗事,将世俗的丑陋冷冷地撕毁给人看;读者在这一幕幕人间悲剧中观照各自人生,这个“审丑”的过程和阅读《红楼梦》的“审美”过程是异质同构的。

张爱玲与曹雪芹之间的重要的精神契合点,一是对时代的悲叹,二是对人生的绝望,具现在作品中的结果,是悲剧现实下的悲剧人生演绎。按照大部分红学家的基本共识,曹雪芹是自觉触及了悲剧的本原,张爱玲的《红楼梦魇》中也有专论主张《红楼梦》“是创作不是自传”。张爱玲对人性与时代的彻底否定,是从她对世人的敌意和对人与事的否定情绪中离析出来的,因此,她的创作总是弥漫着苍凉的情调。面对生活,她的人物永远都是被动的参与者,随遇而安的性格,使他们永远都躲在“没有光的所在”,平庸、消极、不思进取、听天由命,构成了天底下碌碌无为的平民生活。早年的失落于家庭,又与家庭一起失落于时代,与时代一起失落于历史,这些都使她复杂的心灵更为沉重。“对笼罩着这个家的‘昏睡’、‘沉下去’以及‘懒洋洋灰扑扑’的气氛的真切感受,是张爱玲捕捉到的最重要的信息。”^[8]

可以说,张爱玲的精神气质、审美定势、情感取向、创作意识等,都在《红楼梦魇》的考据过程中完成诉求。如果说曹雪芹将《红楼梦》作为末世的直

接诉情文本,那么张爱玲是将“详”《红楼梦》作为末世的间接诉情文本。她穷毕十年精力于一役,将《红楼梦》读得通透,读得物我莫辨,因为《红楼梦》既是她没落贵族精神气质的母体和根系,又是她悲剧意识的消解和终极皈依。

[参考文献]

- [1] 李欧梵. 漫谈中国现代文学中的“颓废”[A]. 中国现代文学与现代性十讲 [C].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49.
- [2] 陈东林. 质疑《红楼梦》的文学价值与社会价值——兼批红学研究的种种误区 [J]. 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6, (1): 14.
- [3] 柯灵. 遥寄张爱玲 [A]. 柯灵 60 年代文选 1930—1992 [C].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82.
- [4] 余凌. 张爱玲的感性世界——析《流言》[J]. 读书, 1991, (7).
- [5] 王国维. 红楼梦评论. 中国古代文学理论辞典 [K].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85: 296.
- [6] 王蒙. 红楼启示录 [M]. 北京: 三联书店, 1991: 258, 259.
- [7] 陈子善. 私语张爱玲 [C].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95: 147.
- [8] 余斌. 张爱玲传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3: 16.

(责任编辑: 杨 睿)

On Non - academic Underlying Meaning of 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

MAO Can - yue

(Hunan Industry Polytechnic, Changsha, Hunan, 410082)

Abstract: Eileen Zhang's "craziness" towards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and its research are the non-academic underlying meaning of her academic work, *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 The commonness between her scholar characteristics and Xueqin Cao's is deeply rooted in their sense of "World's End" in common. Inheriting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s deductive style towards the essence of tragedy, Eileen Zhang deemed comment and study on *The Dream of Red Mansions* as indirect expressive texts, eliminating her sense of tragedy towards the epoch and human nature. Eileen Zhang's *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 provides us with a brand-new perspective of the analysis on herself together with her works.

Keywords: *Dream of Red Mansions*; *Nightmare in the Red Chamber*; Xueqin Cao; Eileen Zhang; underlying meaning